

东海云廊擂鼓山段“怀古园”石像主人考

□陆佳梦 楼正豪/文 记者 张磊/摄



东海云廊是定海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的有机载体,“兼山海之胜,融文化之美”,诸多文化景观意蕴深厚,涵蓄丰富历史元素。擂鼓山段“怀古园”中,立有五件石雕人物残像及两只石虎,这批石像原位于定海城北擂鼓山麓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修建杨梅湾水库,部分用作石材。人物像分为武将身躯四种,文官身躯一种,其中两件武将残躯可以拼合。这批石像 在艺术风格上与宁波鄞州区东钱湖南宋石刻一致,石质均为产自鄞江镇的梅园石。南宋石刻公园散立石像中有一尊武将的甲片形制与舟山石像相同,因而断定舟山城北擂鼓山石像为负责东钱湖石作的宁波石匠所制,年代为南宋。据文物部门统计,浙东南宋墓前石刻总量约300件,东钱湖区域集中了近200件,其中史氏家族墓道石刻占据八成以上,约160件。

关于舟山石像墓主身份,主要有以下几种推测:



一、郎惠说

1626年的《天启舟山志》卷二《闻里·坟墓》载:“郎枢密墓,城北三里杨梅山。”杨梅山正是擂鼓山东部,属擂鼓山的一部分。1715年的《康熙定海县志》卷五《闻里·冢墓》称:“郎枢密墓,城北三里杨梅山,冢址尚存。讳惠,字无考。”更说明这批石像就是郎惠墓道上的,但《天启志》《康熙志》的《选举》《名贤》内容中皆无郎惠生平。1882年的《光绪定海厅志》卷廿六《古迹·冢墓》又云:“丞相郎惠墓,在城北叠石岭。”叠石岭即今定海鸭蛋岭,与擂鼓山有三四公里直线距离,又将丞相郎惠墓归入明代,当有误,并且在《人物》部分亦无郎惠介绍。那么,舟山史上是否有丞相郎惠其人?

查遍宋史史料,无关于郎惠之记录。舟山有郎家桥、郎家庙、郎家岙等地名,史上一定有成规模的郎姓聚居地,但作为宋代一品官的郎惠却在任何史书中找不到痕迹,令人匪夷所思。是否由于南宋末期历史档案都被战火无情销毁了呢?据《元史·董文炳传》载,德祐二年(1276)临安陷落之时,元将董文炳在临安主留事,曾说:“国可灭,史不可灭。宋十六主,有天下三百余年,其太史所记,具在史馆,宜悉收以备典礼。”于是得《宋史》及诸笔记五千余册,归之国史院。宋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高峰,除官方的实录、日历、时政记、起居注、会要之外,还有私人撰写的各类编年史、纪传体史书和笔记小说等,均未提到曾任枢密院使的郎惠,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位人物。

二、应儼说

宋代实行二府三司制,官品共分十八个级别,第一至三品为上品决策机构。从与东钱湖石像的对比可知,只有与史氏家族相当的国家领导阶层才可享受有这样的石像。舟山在南宋时期只产生过两位上品官员,一是应儼,二是余天锡,均做过宋理宗时代的参知政事。南宋以门下、中书侍郎作参知政事,为副宰相的职称,与宰相、枢密使及副使合称“宰执”,官等为正二品。

《宋史·应儼传》道:“应儼,字之道,庆元府昌国人……(淳祐)九年拜参知政事,封临海郡侯,乞归田里。”《宋史·理宗纪》又称:“(宝祐)三年……八月……辛卯(即二十七日),应儼薨。”可知应儼卒于宝祐三年(1255),但未有享年。从《天启舟山志》《康熙定海县志》到《光绪定海厅志》,均载“参知政事应儼墓在城西二十五里浦东”。笔者跟随舟山文史专家们去定海区双桥街道浦东村考察,周边上了年纪之人均能指出应儼墓原位置,并明确表示过去墓道上有石人石马,在上世纪七十年代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,为平整土地而将石

像群敲碎,有的石材用来盖房子。如今置于舟山博物馆旁的一对石羊就是当年抢救出的文物。既然应儼墓位置明确,又不会有人将此处石像搬到近十公里外的擂鼓山,那么石像墓主便排除应儼,最大可能是余天锡。

三、余天锡说

《宋史·余天锡传》载:“余天锡,字纯父,庆元府昌国人。丞相史弥远延为弟子师,性谨愿,绝不预外事,弥远器重之……天锡绝江与越僧同舟,舟抵西门,天大雨,僧言门左有全保长者,可避雨,如其言过之。保长知为丞相馆客,具鸡黍甚肃。须臾有二子侍立,全曰:‘此吾外孙也。日者尝言二儿后极贵。’问其姓,长曰赵与莒,次曰与芮。天锡忆弥远所属,其行亦良是,告于弥远,命二子来……弥远密谕曰:‘二子长最贵,宜抚于纯父家。’遂载与归。天锡母朱为沐浴,教习,礼度益闲习。未几,召入嗣沂王,迨即帝位,是为理宗……嘉熙二年,拜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寻拜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,封奉化郡公。授资政殿学士、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。以观文殿学士致仕。朱氏亦封周、楚国夫人,寿过九十。将以生日拜天锡为相,而天锡卒。赠少师,寻加太师,谥忠惠……弟天任为兵部尚书。”

由史料知,官至南宋参知政事的舟山人余天锡(?~1241)与宁波史氏家族关系紧密。他是权相史弥远(1164~1233)的心腹,年轻时被史弥远延为弟子师,助其立赵与芮为沂王嗣。后在史弥远操控下,赵与芮即帝位,是为理宗。余天锡在拜相前过世,弟余天任为从二品兵部尚书。

见于史载的余天锡墓有两处,一在宁波奉化,一在舟山。成书于1468年的《成化宁波府志》卷一《山川志·奉化县》云:“西圃山,上有宋余天锡墓。”今此地无迹可寻。成书于1626年的《天启舟山志》卷二《闻里·坟墓》载:“余太师墓,城东七十里小展岙之南。”舟山市定海区北蝉小展村有余天锡墓,为近来新造,原墓已毁,并未发现有任何石像。小展余氏为余天锡后裔,但并非从宋代至今一直生活在当地,约于明末清初由宁波迁来。舟山自明洪武十九年(1386)实行海禁,至明万历年间(1573~1620)倭患渐除,才有居民陆续迁入。《天启舟山志》的作者何汝宾于天启二年(1622)调任昌国参将,次年被擢为宁绍副总兵,仍驻守舟山,天启六年(1626)去职,迁广东督参金事。何汝宾所录余天锡墓很可能是余氏后裔回迁舟山后,为祖先所造的衣冠冢。而真墓在擂鼓山一带,不知因何原因,何汝宾及后来清代舟山方志撰者均录为“郎枢密墓”或“丞相郎惠墓”。

笔者推测舟山擂鼓山“怀古园”石像主人 为余天锡的理由如下:首先,宁波同一风格的

南宋石像多属于史氏家族,余天锡是南宋舟山地区与史弥远关系最近,且为正二品官阶的高级官员。余天锡去世后,其墓葬石像由专为史家服务的石匠集团在宁波制作,经海路运至擂鼓山,其次,舟山市定海区北蝉小展村的余天锡墓址及周边,历史上未曾发现过石像,疑是后代所造纪念祖先的衣冠冢。再次,余天锡的谥号是忠惠,与舟山古方志在擂鼓山所标注的丞相郎惠墓存在一定联系。最后,舟山石像与宁波东钱湖余天任墓道文武石像形制一致,由同一批石匠集团负责余氏兄弟墓道石像制作的可能性很大。

四、其他说

除上述说法外,地方史学者还曾提出过“孙枝说”“袁甫说”“宋高宗随行高官说”及“流配官员说”等假设,现逐一分析如下:孙枝仅见于舟山地方志记载,《元大德昌国州图志》《天启舟山志》《光绪定海厅志》称,孙枝与二子同登进士第。孙枝擅长军事,官职为从七品至从九品的“参军”或从九品的“迪功郎”,二子散官阶均为从五品下的“朝散大夫”。虽然史载孙枝墓在舟山城北,但官位太低,无法享用如此高规格的石像。

袁甫在正史中有传,《宋史·袁甫传》载:“袁甫,字广微,宝文阁直学士燮之子,嘉定七年进士第一……权兵部尚书,暂兼吏部尚书,卒,赠通奉大夫,谥正肃。”袁甫是“甬上四先生”之一的袁燮(1144~1224)之子,官至从二品兵部尚书。《天启舟山志》卷二《闻里·坟墓》载:“袁状元墓,墓有二:一在岱山梁家桥之西。一在城东二十里,陈家岙之南。”《天启舟山志》卷三《人物·名贤》称:“袁甫,字广微,岱山人。少微寒,失怙恃,漫迹于鄞慈间。尝受业慈湖、絮斋二先生之门。”袁燮、袁甫父子为鄞人,《天启舟山志》竟指为舟山岱山人,更不知絮斋先生袁燮便是袁甫之父。宁波古方志中有袁甫墓在鄞县的确切记录,《天启舟山志》的说法可信度不高。

最后,由于宋高宗于建炎四年(1130)为避金兵曾驻蹕舟山,因而有随行高官死在舟山,留下大墓的观点,以及有南宋大官流配于此的主张,均无史料支持,不足为信。

瞻怀古迹,启索探脉,古代石像是定海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展现。擂鼓山段“崇文重学”,作为舟山海岛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,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文化获得感。关于石像的主人是谁,虽无法下定论,但为余天锡的可能性很大。旧传舟山城北擂鼓山下有海路,具备石像由宁波运来的运输条件。从宋至清,宁波梅园寺曾远输日本,运抵舟山则不在话下。但在直接证据出现之前,“余天锡说”也仅是众多假设的一种。

作者单位:浙江海洋大学

虞之留痕

在宽窄巷子看川剧

□应红枫

随着摩肩接踵的人群踏入宽窄巷子,两边都是颇有年代感的清代风格建筑,里面的很多古民居,大多被用作商铺餐馆,少数私宅大门紧闭,墙上挂着“私人宅院,非请莫入”的牌子。巷子两边除了琳琅满目的商铺和茶馆,还有几处摆摊表演的艺人。几位大叔大妈拗着造型和几位“铜人”合影,更多的人群则拥挤在巷子的各个景点,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留念。

宽窄巷子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,由宽巷子、窄巷子和井巷子三条老式街道及其鳞次栉比的四合院群落组成,巷子保留了成都传统建筑风格和历史文化风貌,包含约70座传统四合院院落,占地约32公顷。这里的建筑多为清朝时期的四合院式风格,砖木结构,黑瓦白墙,朱红大门,古色古香。宽窄巷子呈“U”形布局,拐弯处有一较为宽阔的广场,可供游客休息。宽窄巷子是成都遗留下来的较为完整的清朝古街道,据记载,宽窄巷子是清朝重臣夔尧修筑的满城,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,在平定了准噶尔之乱后,选留千余

兵丁驻守成都,在当年少城基础上修筑了满城。清朝居住在满城的只有满蒙八旗,满清没落之后,满城不再是禁区,百姓可以自由出入,形成了旗人后裔、达官贵人、贩夫走卒同住满城的独特格局。

巷子里有很多餐馆、茶馆,游客可以在此体验传统的川剧表演、茶艺表演,品尝正宗的成都小吃,如龙抄手、麻辣烫、串串香等。为招徕顾客,很多餐馆在餐区的正前方设置舞台,为客人表演川剧,既为客人提供美食,又让客人享受视觉盛宴,更传播了川剧文化,这个创意不失为文旅结合的上上之策。趁着闲逛有些疲乏,我也坐进了巷子边的“自在戏院”感受了一回川剧的魅力。演出的内容有戏曲、小品、相声等,在传统川剧的基础上,融入了现代生活的元素,比如台上的演员表演“成都把耳朵”(怕老婆)和老婆相互捉弄时,以一些日常的生活细节,逗引得台下的观众捧腹大笑。

在台上表演的演员专业功底不浅,不是

民间的“草台班子”所能概括,他们把传统的川剧艺术,创新融合了现代戏曲表演的幽默风趣成分,不时博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。川剧中最叫好的,莫过于“变脸”的绝技了,在宽窄巷子现场表演中也作为压轴戏上场。四位演员身着传统的川剧表演服装,或执扇子,或挥旗帜,也有武生打扮的,在他们眼花缭乱的表演中,每一次转身,或挥动手中的表演道具,都能迅速变换脸谱,甚至还能变换身上所穿的斗篷,让观众惊叹不已,博得大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
看台台上演员表演的宽窄巷子人文历史典故时,让人领悟到“宽窄”是一种哲学,“宽窄”更是一种自律的涵养。最宽的是人心,最窄的也是人心。人的心胸,多欲则窄,寡欲则宽。大无是宽,大有是窄,人生之道,尽在这宽窄之间。人生的境界不是“宽”与“窄”的对立,而是“宽”与“窄”的通融。

成都的宽窄巷,和安徽桐城的六尺巷一样,都已经沉淀成为一种文化,一种处世的哲

学。在清代康熙年间,安徽桐城大学士张英的府第与吴姓人家相邻。吴家盖房欲占张家隙地,双方发生纠纷,告到县衙。因两家都是高官望族,县官难以定夺,张家便驰书京都,希望张英出面制止。张英阅罢,立即批诗寄回,诗曰: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?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张家得书后,主动让出三尺;吴家被张家的所感动,亦退让三尺。于是,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,即“六尺巷”,美谈传颂千古。人生有得必有失、有失必有得,只有不断反省,懂得取舍,才能不断完善自己。

成都的宽窄巷子集中了成都最接地气、最具烟火气的民间文化,也呈现了现代人对于一个城市的记忆。在宽窄巷子里,能品味成都的一种精神,呈现了老成都优雅的慢生活。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上个世纪的老成都人摆龙门阵、看皮影、看木偶戏、即兴写书法等悠闲生活状态,使宽窄巷子成为游客体验品味成都精致特色文化的打卡地。